

李达与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Li Da and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澳—尼克·奈特◎著  
汪信砚 周 可◎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李达与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Li Da and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澳—尼克·奈特◎著

汪信砚 周 可◎译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 [澳] 尼克·奈特 著；汪信砚，周 可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

ISBN 978-7-01-019339-7

I. ①李… II. ①尼… ②汪… ③周… III. ①李达（1890—1966）—生平事迹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 K827=6 ② 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6121 号

原书名：Li Da and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原作者：Nick Knight

本书根据 Westview Press 1996 年版译出

版权登记号：01-2015-3008

##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LIDA YU MAKESIZHUYIZHIXUE ZAI ZHONGGUO

[澳] 尼克·奈特 著 汪信砚 周 可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19339-7 定价：7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前 言

在《马克思主义主流》的第1章，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提出了思想史家所面临的一大理论困境<sup>①</sup>。思想史家是应该关注观念自身，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观念所处的环境或是与它相关的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还是应该把观念主要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环境的产物，看作是真实的历史舞台的副现象呢？对前一种观点的肯定回应主张关注观念自身。从这一角度来看，政治和哲学中的重要且持久的问题是由观念自身提出来的，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持这种观点的思想史家可能对一种学说或哲学如何影响各个时代的信众，而不是对可能影响这些学说或哲学的不同历史环境更有兴趣。在这里，他们所思考的重点是观念的连续性，是谱系学。然而，对后一种观点的肯定回应强调观念应理解为受限制的、具体的历史环境的产物。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接近于知识社会学，它认为环境起支配作用，观念的社会起源特别是观念所服务的社会和政治利益是重点。环境战胜了观念，一旦环境改变，观念相应地转变；产生于不同时期和地点的观念必须适应不同社会环境的特定要求。这里所强调的重点是非连续性，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对观念所产生的影响。

科拉科夫斯基对这一困境的回应是选择中间立场，既恰当地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以往哲学家的联系以及后来被当作马克思思想自身的核心要素之间的连续性，又承认不同的社会条件施加于后来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的影响。对于科拉科夫斯基而言，他的任务是实现对连续性和变动性二者的适度承认，在保留那些历经了时空变迁的侵蚀性影响而幸存的关键命题中的概念的同时探讨不同形态

---

<sup>①</sup> 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1卷，唐少杰等译，苏国勋等校，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的马克思主义。

与科拉科夫斯基不同，我对李达的哲学和理论观点的分析不寻求中间立场。我研究李达思想的兴趣主要不是出于对李达个人的兴趣，而是由于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阐释和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开始注意到李达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源于此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起源的研究<sup>①</sup>。这一研究的结论认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李达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和著作进入中国革命运动，并且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我还发现毛泽东深受李达的名为《社会学大纲》的哲学著作的影响，这部著作大量吸收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告诉我，李达的哲学和理论著作可以看作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它与欧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联系的有效中介。在我看来，这种联系比很多评论者试图使我们相信的更为牢固和紧密。因此，我认为，对李达的哲学和理论著作的分析能够对那些把中国马克思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怪异的、异国的分支的观点起到有效的纠偏作用，那些观点主要是从中国环境的文化的、社会的独特性质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出发的。

于是，我对李达的兴趣主要是由对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来源以及他为中国读者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所激发的。本书所强调的是观念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一方面存在于欧洲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哲学的正统信条之间，另一方面存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哲学的维度。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完全忽视李达生活与写作的历史背景，贯穿于本书的还有一个传记式的主题，它较好地李达的哲学和理论著作置于他所生活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本书的开篇部分是李达的生平简介。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李达几乎不被西方所知晓。尽管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但是在英语世界实际上没有关于他的论著。传记式主题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本书的任务之一是探讨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之间的关系，因为通过对毛泽东的影响，李达能够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更为广泛的辐射。不过，一般而言，与李达的思

<sup>①</sup> 参见尼克·奈特 (Nick Knight) 主编：《毛泽东论唯物辩证法：1937年的哲学著作》(Mao Zedong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Writings on Philosophy, 1937,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0)；亦见尼克·奈特 (Nick Knight)：《苏联哲学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Soviet Philosophy and Mao Zedong’s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当代亚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20, No. 1 (1990), 第89—109页。

想特别是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以及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相比，李达的生活和时代居于次要地位。

当然，这些话题都十分复杂，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读者可能认为李达所使用的一些语言晦涩难懂。不可避免的事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同一片十分浓密的灌木丛，让人难以看透和理解。不过，如果我们要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就必须作出这番努力。正是由于这一工作的复杂性，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评论家对它与欧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相似性缺乏应有的尊重。我认为，我们越是细致地考察李达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以李达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正统之间的相似性就越发明显。因此，分析李达的哲学和理论著作能有助于纠正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流行谬见。

许多人为我完成这本著作提供了帮助。达雷尔·多林顿（Darrel Dorrington）组织了在北京多家图书馆查找李达文献的工作。王玉萍帮助我理解李达所使用的中国术语，并且抽空与我讨论了他的哲学。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的弘子·威尔科克（Hiroko Wilcock）博士热心地识别了李达译著的日本作者的姓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李君如、张彩云和钱宏鸣向我介绍了当代中国对李达的评价，还帮助我找到了李达翻译的许多文本。没有他们的帮助，第五章就不可能完成。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任武雄教授与我讨论了李达早年的理论和政治活动。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王进、李勇和戴立勇为我在武汉大学期间提供了许多实际的帮助，让我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陈祖华教授、谭臻教授和段启成教授与我分享了他们收藏的李达资料，并且利用他们的宝贵时间讨论了本书所涉及的哲学和理论话题。我非常感激他们的款待和热心。武汉大学政治学系宋镜明教授是李达的传记作者之一，他抱病与我一起讨论李达的生平，还分享了他的许多著作。作为中国最有名的翻译家之一，武汉大学英语系袁锦翔教授为我提供了他关于李达翻译方法的观点。武汉大学法学系的孙爱娣向我介绍了研究李达的俄文资料。中国研究李达哲学思想最有名的权威之一、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系王炯华教授花费大量时间与我讨论李达的生平和著作，他和他的妻子还为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格里菲斯大学亚洲和国际研究中心出版部门的詹妮琳·曼（Jennilyn Mann）为整理本书的手稿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同样，苏·贾维斯（Sue Jarvis）极为出色地编辑、校对了手稿。她还完成了本书

的索引。

我谨向这些好心的、帮助过我的人们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的帮助使得这本著作得以完成，也让通常是寂寞且令人沮丧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变得十分愉快。即使他们不完全赞同本书的观点，他们仍能确信他们为我理解李达生平和著作这一复杂问题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后，向吉尔·肯妮（Jill Kenny）致以我最深的感激和爱意。这么多年来她的爱和支持让我能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和教学。谨以此书献给你——吉尔，并致以爱和感谢。

尼克·奈特

格里菲斯大学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战争与革命年代的哲学家生涯	1
一、导言	1
二、早年生活	3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余波	6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李达离开共产党	8
五、党外的真诚信仰者	12
六、党外生涯：“同路人”	13
七、北平时期	16
八、抗日战争时期	17
九、重新入党	18
十、解放后的哲学与政治	19
十一、最后篇章	21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理论：李达思想的来源	25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社会变革与哲学	28
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确立与辩护	36
三、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42
四、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1931—1936）	44
五、辩证唯物主义：与日本的联系	49
六、李达与“正统”	52



第三章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 (1919—1923)	55
一、《什么叫社会主义?》	55
二、马克思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	57
三、《社会革命底商榷》	60
四、批判梁启超和无政府主义者	63
五、《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65
六、《马克思学说与中国》	67
七、结论	72
第四章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3—1932)	77
一、《现代社会学》: 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	78
二、《现代社会学》: 社会发展和社会意识	82
三、阶级、法律和政治	85
四、辩证法和哲学	87
五、结语	91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翻译	95
一、李达论翻译	99
二、考茨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郭泰和唯物史观	101
三、高阜素之与社会问题	104
四、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	107
五、塔尔海玛、卢波尔和河上肇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111
六、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116
七、译著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23
第六章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128
一、写作与出版	129
二、影响	131
三、作为“作者”的李达	135

四、毛泽东论唯物辩证法：《社会学大纲》的影响 .....	137
五、毛泽东读《社会学大纲》的批注 .....	139
六、《社会学大纲》：来自中国的看法 .....	146
七、结论 .....	149
第七章 《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法则和范畴 .....	152
一、导论 .....	152
二、人类认识史上的唯物辩证法 .....	154
三、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 .....	156
四、本体论：物质与运动 .....	158
五、唯物辩证法的对象 .....	159
六、唯物辩证法的法则和范畴 .....	162
七、《社会学大纲》与文本间一致性 (intertextual congruence) .....	175
第八章 《社会学大纲》：认识论和逻辑学 .....	177
一、当作反映论看的认识论 .....	178
二、当作认识的出发点看的感觉 .....	179
三、感觉与思维 .....	181
四、表象与概念 .....	182
五、判断 .....	185
六、推理 .....	186
七、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 .....	187
八、形式逻辑批判 .....	189
九、历史唯物论 .....	191
十、《社会学大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 .....	192
第九章 李达与毛泽东思想 .....	195
一、李达、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	197
二、读毛泽东的《实践论》 .....	199
三、读毛泽东的《矛盾论》 .....	205

四、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 .....	213
五、结论 .....	216
第十章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著作 .....	218
一、20 世纪 50 年代批判胡适的著作 .....	219
二、20 世纪 50 年代批判费孝通的著作 .....	225
三、“大跃进”时期的理论著作 .....	229
四、《唯物辩证法大纲》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	238
五、《唯物辩证法大纲》：辩证法的规律 .....	242
六、《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命运 .....	246
第十一章 结论：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	249
参考文献 .....	257
译后记 .....	269

# 第一章 战争与革命年代的哲学家生涯

## 一、导言

虽然本书主要是关于李达的哲学和理论思想的起源、结构、发展及影响的研究，但出于介绍李达的目的，本书的第一章是李达的简要传记。尽管李达在中国广为人知并受到普遍尊重，但他在西方几乎毫无名气，甚至很少被研究中国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学者提及<sup>①</sup>。本章主要依据中文的传记资料<sup>②</sup>，也利用了对过去李达

① 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唯物辩证法哲学论战的唯一一部重要著作几乎没有提及李达。参见沃纳·迈斯纳 (Werner Meissner):《中国的哲学与政治: 20 世纪 30 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China: The Controversy Over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the 1930s*,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1990)。同样, 阿里夫·德里克那本优秀的《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 1919—1937》(翁贺凯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也没有提及李达, 尽管李达被德里克 (Dirlik) 的《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所提及。迈克尔·卢克 (Michael Y.L. Luk) 称李达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尤其是非常有助于了解党的意识形态的最初框架”的理论家, 参见《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 意识形态的形成 (1920—1928)》(*The Origins of Chinese Bolshevism: An Ideology in the Making, 1920—1928*,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第 58、232 页。英语世界对李达的简短介绍, 参见霍华德·鲍曼和理查·霍华德 (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记词典》(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第 2 卷以及 O. 布里埃 (O. Briere) 的《中国哲学 50 年 (1898—1948)》(*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98—1948*, New York: Praeger, 1965)。

② 《李达同志生平事略》, 载《李达文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3—20 页; 王炯华:《李达——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 载李振霞主编:《当代中国十哲》, 华夏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9 页; 王炯华:《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李其驹、陶德麟等:《李达一九四九年前理论活动及著作编年》, 载《中国哲学》1979 年第 1 辑, 第 345—372 页; 宋镜明:《李达传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的同事<sup>①</sup>与专门研究李达的生平和思想的学者<sup>②</sup>的访谈。

李达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几个动荡的阶段——清王朝的衰落与灭亡、民国早期和军阀割据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初次合作与后来的殊死对抗、抗日战争、共产党在1945—1949年内战中的胜利、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鸣大放”。这是李达崛起为一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历史背景。虽然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所要看到的，李达的哲学思想明显地受到了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哲学发展的影响，但是，对于我们理解他在中国解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的贡献而言，中国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以及李达在其中所参与的部分不是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与同时代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李达不只是一位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活动家——他把自己卓越的才智献给了中国革命。李达的大量著作，无论是关于法律问题、财政管理问题、中国社会分析、妇女解放问题的，还是我们主要探讨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全都致力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革命事业。这一点甚至体现在他那些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最抽象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中。因为李达撰写《社会学大纲》（1935、1937）等哲学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在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队伍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促成对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制定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策略。

不过，虽然李达生活和写作的中国背景十分显著，但同样需要牢记在心的重要一点是在李达生活的时代流行的国际背景，而且最关键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苏联的政治和哲学领域所出现的情况，因为它对李达的政治生涯以及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的视角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本章和后面的章节将呈现出这两方面的许多插曲，并会展开详细的讨论。第一段插曲是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介入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一合作采取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共产党作为下级服从数量更多、力量更强大的国民党的方式（这一方式被称为“党内合作”）。李达对这一政策所持的强烈反对导致他作出了退出自己曾经努力工作而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的决定。有必要探讨这一举动对他后来作为革命运动中的哲学家的事业的寓意。

<sup>①</sup> 包括陈祖华、谭臻、宋镜明、王炯华、段启咸和袁锦翔。

<sup>②</sup> 特别是宋镜明和王炯华。他们的李达研究著作目录，见本书的“参考文献”。

第二段非常重要的插曲是从1931年开始在苏联哲学界所发生的剧变，它导致了重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模式，这一模式主张哲学从属于共产党的需要。这一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哲学正统的出现强烈地影响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并且通过他的努力，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此，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包括围绕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和功能而展开的政治斗争。

在考察苏联所发生的事件和知识界的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李达与日本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20世纪10年代李达在日本的学习让他掌握了流利的日语，从而得以后来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为中文；像河上肇和杉山荣等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阐释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影响因素。李达正是借助他们的日本译作而把许多欧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为中文。他在日本的旅居生活还向他提供了国际性的视角，这一视角是他在中国的革命同志所不具备的，它使李达倾向于把超越中国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当作正统。

## 二、早年生活

李达，号鹤鸣，字永锡，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零陵县的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李辅仁虽然出生在农民家庭，但读过几年书，当过学徒，教过蒙馆，做过小生意。从五岁开始，李达就跟着父亲识字，并有幸获得了他父亲的同乡好友胡燮卿的赏识。胡燮卿是秀才，曾经通过了乡试。1905年，李达进入零陵县的永州中学，在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激起了他的爱国情感。第一件事是他所在学校收到了一封血书。血书的作者徐特立用这种悲壮的方式劝诫学生支持反对日本和拯救中华民族的运动，他后来曾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第二件事是李达和同学们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行动，还在操场上焚毁日本生产的文具。后者的讽刺意味在于，他们用以放火焚烧文具的火柴正是日本生产的，但他们必须把它保留下来，因为如果这些日本火柴也被扔进火堆的话，他们将无法点燃剩下的一堆日本产品<sup>①</sup>。

<sup>①</sup> 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1909年，李达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那里他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想。然而，在1911年革命后，受到孙中山提出的“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的影响，李达决定从教育转到科学和技术，并转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13年，李达通过了湖南省出国留学考试，成为一名留日官费生。不幸的是，他染上了肺结核，不得不返回中国。1917年，他第二次去东京。这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对李达后来的政治和哲学生涯产生了强烈影响。第一件事是日本日益增长的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企图。日本政府在1915年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一旦实施，将把中国实际上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行为表现出耻辱和敌意相混杂的情绪，但是，正如李达后来所回忆的，他们对中国的出路感到非常茫然<sup>①</sup>。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另一事件完全消除了李达可能感到的不确定性。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受到了李达的热烈欢迎，因为他认为这是中国应该走的革命道路。它也导致李达对激发俄国革命的思想理论产生了兴趣。借助于日本杂志、报纸和刊物上的资源，李达开始了伴随其一生的学术研究，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对李达的思想以及他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而展开的迅速行动的巨大影响非常明显，因为他是早期中国激进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之一。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有力地论证道，俄国革命不像很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对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恰相反，在应对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威胁时，他们最初转向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通常是在经历了无政府主义的学徒时期之后，他们才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sup>②</sup>。例如，毛泽东直到1920年的某一时期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之前他受到了作为社会思潮之一的无政府主义尤其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影响<sup>③</sup>。不过，尽管德里克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解释适用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它却不适用于李达。李达在早年出版的著作中讨论了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区别，激烈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

① 李达：《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合刊。原文标题为《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译者注

②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

③ 参见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对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引用，载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

主张。仅凭这一理由，李达思想发展的轨迹与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被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张所吸引的主要趋势形成了有趣且有意义的对照。

1918年段祺瑞领导的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允许日军进入中国满洲的协议之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留日学生救国团”；他们组织罢课，并且开始返回中国。李达在这些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他是第一批离开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之一。5月，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代表之一回到北京，很快投入到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学生运动中。由于向政府请愿等学生运动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没有产生效果，这场运动的失败给李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达后来认识到，民众只有像俄国革命那样站起来推翻政府的反动统治才能成功。而要走上这条道路，正如李达在1961年所回忆的，有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sup>①</sup>。

1918年6月，李达怀着新的信念，第三次抵达日本。然而，他放弃了理科学习，并且在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河上肇的指导下，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学习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系列著作。他还翻译了荷兰马克思主义者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高阜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和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sup>②</sup>。这些译著后来在中国出版。实际上，李达所翻译的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是李大钊在1920年3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所的学习材料之一。这表明，李达很早就把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作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步，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和整个二三十年代中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匮乏的情况下。李达通过译作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贡献对于理解扎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类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将在下一章更为细致地考察他的政治和哲学生涯的这一方面。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李达身处日本，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不过，这场运动以及后来的“六三”运动促使李达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接连完成并

① 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② 据考证，李达实际上并没有翻译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参见汪信砚：《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一——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考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11期。——译者注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陈独秀和新思想运动以及一战前夕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sup>①</sup>。在某些重要方面，这些早期文章确立了李达后来大量著作的基调。第一，它们主要关注与社会主义、左翼政治和思想相关的话题。他最早发表的分别题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的文章与他后来的著作的主题完全一致。第二，这些文章有意以一种促进信息和现成观念传播的方式，提供了对复杂的事件、问题和概念的解释，因而具有指导性。第三，这些早期文章清楚地表明李达是一个饱含政治激情和价值的知识分子，这一特征最终奠定了李达著述颇丰的一生的基调，因为他后来完成的著作都伴随着他头脑中的政治目标。于是，李达所具备的卓越的写作能力和翻译技巧从一开始就服务于他直到生命尽头仍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

###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余波

1920年夏，李达前往上海，在那里他与陈独秀展开讨论<sup>②</sup>。李达、陈独秀、李汉俊和陈望道以及其他一起成立了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组织<sup>③</sup>。这个小组不仅仅在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联络中国各个地区的小组，还在1920年11月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刊物——《共产党》月刊，并且任命李达为主编。这份刊物致力于探讨社会革命的原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党建理论；它还批判机会主义，提供关于俄国革命的成就和经验的信息，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讨论中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共产党》月刊的发行量最高达到五千份，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媒介；毛泽东是它的征订者之一，他赞扬这份刊物是“颇不愧‘旗帜鲜

① 这些文章可以在《李达文集》第1卷中找到。

②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李达活动的更多细节，参见李其驹：《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的建党活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③ 李达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创立时间是1920年7月，参见李达：《七一回忆》，《七一》1958年第1期，第11—12页；托尼·赛什（Tony Saich）：《中国第一条统一战线的起源：马林的角色》（*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uring)*，Leiden: E.J. Brill, 1991），第1卷，第46页。